

一教授公开宣称不再参与本科毕业设计考评

毕业设计流于形式 大学教师左右为难

本报记者 邱晨辉
实习生 冯祥明

眼看就要毕业离校了，牟立明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赶紧找个地儿把自己‘卖掉’”。他的精力几乎全部投入到找工作上：白天早起参加面试，晚上修改并网投简历，没有面试的周末再去各个招聘会走场。

在忙活求职大业的同时，这位北京某重点高校计算机专业的大四学生不得不为另一件事分心——断断续续耗时近两个月的毕业设计和近3万字的毕业设计报告。

每逢毕业季，高校毕业生身上便背负着“两座大山”——“就业”和“毕业”。不过，不管是校内的BBS上还是校外的社交网站上，充斥的更多的是有关“就业难”的呼声，“毕业难考”则似乎从来不是个问题。

“我找到工作了还能不让我毕业？”抱着这样的心态，牟立明搬出就业难、实习忙的理由，向院系学生工作老师和指导教师交差，“混过去了就‘完事大吉’了。”

像牟立明这般应付毕业设计，在本科生中是普遍现象。前不久，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光电信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彭真明在科学网博客中明确表示——从今以后不再参与本科毕业设计的考评工作——此观点一出，再次引起了高校师生对“毕业设计走过场”的关注。彭真明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有的学生到最后甚至连起码的任务都还没搞清楚，答辩前东拼西凑就形成设计报告，这样的考评工作不做也罢。

毕业设计买卖成风，造假手段五花八门

文科专业的毕业论文能直接买卖，理工科专业的毕业设计也可以明码标价“代写代做”，这就是“学生们对待毕业的现状”，彭真明用“极其混乱”一词来形容。

杨琳是北京一名自动化专业的大四学生，和牟立明一开始就抱着应付的心态不同，她起初信心满满，准备好做一个设计——“动态汽车的硬件原理与设计”，但在收到考研调剂失败的信息后，她改变了想法。

4月的一天，室友传来“可靠消息”，“本科毕业设计的要求并不严格，听师兄说，没有实验和数据也没啥大问题，即便设计的是一个失败的产品也没人卡，最终都会通过。”

“那还费什么劲儿啊？直接买！”于是，几个室友合计着去网上淘“成品”。杨琳花了200元买了一份与汽车硬件原理相关的电路设计，然后仿照其中的电路图，一小块一小块进行设计说明，照着葫芦画瓢，没多久就完成了毕业设计。

中国青年报记者在淘宝网站上以“毕业设计”为关键词搜索，有31052条数据出现。在这些从20元起步的“宝贝”（商品）中，最高价格达1680元，是一份名为“定制开发asp.net网站毕业设计管理系统”的商品，销量最高的是来自辽宁沈阳的毕业设计商品“计算机网站开发”，每月成交量达561笔。

朱永新：考试不改 教育难兴

本报讯（记者李斌）“庆父不死，鲁难未已；考试不改，教育难兴。考试已经成为制约我国教育发展的牛鼻子。”近日，在新教育研究院主办的“新教育·新评价·新考试”高峰论坛上，“新教育”发起人、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说，如果考试和评价制度再不能实现重大的突破，素质教育和课程改革将很难进一步深化，教育的深入发展和改革也很难真正持久。

朱永新说，中国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序幕在1999年6月被拉开后，至今已过去10多年，新课程改革的实验和探索也走过了10年，“但是，很坦率地说，轰轰烈烈的素质教育依然是轰轰烈烈，扎扎实实的应试教育依然是扎扎实实。”他认为，由于缺乏和素质教育以及新课程改革相配套的考试评价机制，缺乏有效的考试方法，我们的学校和老师依然为分数而教、为分数而学。“现行考试评价制度不但没有起到应有的推动素质教育改革和课程改革的积极作用，反而在发挥着破坏性的作用。”朱永新说，对考试和评价制度的变革已经成为当今中国教育的一项非常紧迫的任务。

在这个以“新评价”和“新考试”为主题的论坛上，学者们表达了推动评价和考试制度改革的迫切心情。著名教育学者杨东

平认为，目前应试教育的状况不仅仅是扎扎实实，而且在“深化和恶化”，它的整体危害性和残酷性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杨东平说，在10多年前国家开始高考扩招的时候，曾有一个预设，即随着高考独木桥的拓展，可以极大地改变应试教育的困境。今天，高考录取率已经达到了75%左右，应试教育却愈演愈烈，与规律不符。其中原因值得深思。“核心问题就是评价和考试制度没有发生相应的改革。”杨东平同时认为，高考制度不能承担所有的责任，因为它“指挥不了小升初，指挥不了幼小”。

而教育学者熊丙奇认为，要推动考试和评价制度改革，核心是要打破行政部门的垄断。他引用近年来频繁出现的各类考试泄题事件来说明垄断的后果：不管考试的质量和安全性怎么样，独此一家，别无选择。由于是独此一家，它难以对考生负责，也不会对社会舆论负责。

“如果不打破行政垄断教育和考试的格局，我们的考试是没有竞争的。没有竞争，就不可能有考试评价的提高。没有考试评价的提高也就不可能有教育整体水平的提高。”熊丙奇说，考试和评价要走市场培育的道路，让更多的社会中介机构来竞争。

那些想让孩子学音乐的家，周海宏给了3条建议：一、每个孩子一生至少要学一门乐器，且要坚持学到初三；二、应该让孩子自己去选择想要学习的乐器；三、业余学琴不要学“成”了，过于专业化的教育会让孩子学一门技术，恨一门艺术。

学生让考评组为难，但老师不想为难学生

彭真明的这篇博文得到了不少高校教师的呼应。有教师留言说，彭写出了教师备受良心折磨的心声，一边是学术的水准，一边是学生的前途，学生在面临选择的同时，作为评委的教师又何尝不是？这也是彭真明宣称不再参与考评的最直接原因，“学生让考评组为难，但老师真不想为难学生。”

回忆起去年毕业设计答辩时遇到的一个学生，彭真明颇为感慨。当时，这名学生已经找到一份比较理想的工作，但其毕业设计却没有扎实的数据和有效的实验。如果照章办事，这名学生是很难通过评审的。这就意味着这个学生将拿不到学位证，“到手的工作也就泡汤了”。彭真明犹豫了。

最终，他“放过了”这名学生，给了61分。“因为60分不好看，61分表示过了，只是做得差一点，这样至少不会影响到他的工作。”彭真明告诉记者。

“就业、考研”和毕业设计就像鱼和熊掌，难以兼得，时间少似乎是这一问题的关键。有老师建议，适当延长毕业设计的时间，应该可以改变当前毕业设计与找工作冲突的情况，比如，让学生从大三就开始找选题，在实习的过程中就确定毕业设计的思路，等等。

不过，类似这般从时间上动脑筋的想法并不具有太大的可行性。有学生指出，大三的学分虽不多，但大多是专业课，需要更多的时间泡在图书馆里进行深层次阅读，此外，高年级学生的实习实践活动也比较多，很难挤出一大段时间来做毕业设计。

“根本不是时间的问题！”有人在彭的博文下留言，“只要愿意做，想做好，毕业设

计一定能做好。”在持这种观点的人看来，本科生的毕业设计之所以在很大程度上走形式，其原因不仅仅在那些学生身上，还与高校教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不作为”有很大关联。

燕山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刘新建告诉记者，在平时的教学工作中，一些教师尤其是资格相对较老的教授，就很少对学生的作业进行批改，而是多交给研究生助教来做。没了及时和有效的监管，抄袭便“处处开花”，而年级愈高，抄袭现象就愈严重。

“对那些平时习惯抄袭，找人代写作业的学生来说，在毕业设计（论文）上弄虚作假是一种习惯性的反应。”刘新建说。

学校绝不会让毕业设计拖就业率的后腿

到底是学生毕业设计的质量水准愈来愈差致使评委的评审标准逐步下降，还是因为评委的评判标准越来越松，让毕业设

计的质量走上下坡路？这个有点类似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让不少教师感到困惑。

就毕业设计的考评工作来看，因为本科生人数众多，学校层面很难做到一一评审，不少学校便组织一些专家学者，对学生的毕业设计进行抽查。然而，由于专业领域不同造成的知识隔阂，使得专家们的考核也多着眼于形式，例如审查毕业设计报告字数的多少、工作量够否、图表规范与否等等。

具体到内容方面，还要依靠指导老师的“把关”。但是，扩招10多年来，教师少、学生多已是大多数高校都要面对的现实。刘新建说，他所接触到的教师中，一个教师最多的时候要指导二三十个学生进行毕业设计，“老师们分身乏术，没办法对每一个学生都进行非常细致的指导，其设计质量也就可想而知。”

这版“无能为力”的局面让身处中间的

教师显得有些尴尬。山西大学一位姓万的教授看到彭真明的这篇博文后说，不止一个同行告诉他，“真要给某个学生毕业设计不及格，影响到了他的毕业和就业，家长会找来，学院管学生工作的副院长也会找来，甚至学校的领导也会来打招呼。”

“学校真的会催着评委赶紧给学生‘过’的。”万教授告诉记者，学校和院系都不愿对毕业设计“设太高的门槛儿”，如果学生迈不过答辩这道坎儿，就无法顺利拿到学位证，出去就业自然受阻。这对于学校的就业率是个很大的影响，而学校绝不会让毕业设计拖了“就业率”的后腿。

近几年，高校统计就业率的做法虽然为社会舆论所诟病，但一直未曾停下脚步，其最终的数据不仅关系到高校的财政拨款和专业审批，还会影响到学校的形象和招生状况。“相比学校的‘生存大计’，学生的毕业设计自然成了两害相权取其轻中的‘牺牲品’。”万教授说。



5月8日，南京，美术学院的毕业生在摆放自己的雕塑作品《我要告诉你》。 CFP供图

调查显示，相比城市，九成流动儿童更喜欢自己的老家

流动儿童融入城市面临新挑战

本报记者 朱丽亚

“除了男女厕所以外，生活中还有哪些常见的标识？”台上的老师问。“安全的！”“吸烟的！”“禁止说话的！”台下的学生七嘴八舌地抢答。

一个春日的下午，一堂关于标识大PK的课程正在重庆市江北区猫儿石实验学校四年级3班的教室里进行。台上稚气未脱的两位老师一个叫赵中华，一个叫刘柳，他们都是重庆工商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三年级的学生。

这一天，相同的课程还在四年级、五年级和初一年级其他8个班级同步进行，授课老师也都是赵中华和刘柳的大学同学。台下听讲的大部分学生都来自农村，父母在这个城市打工。

这些孩子比刘柳他们想象中的要活泼很多，一堂80分钟的课上下下来，他们把嗓子都喊哑了。这是他们第3次来授课，刚走进教室，学生们围上来，一个小女孩说：“老师，你今天的发型很好看！”另一个小男孩则拿了纸和笔让刘柳写下她的QQ号码。“他们都有自己的QQ号。”刘柳说。

“标识大PK”是《打工子弟城市融入与成长》课程中的第3节课。这个专门针对打工子弟的课程是由重庆NGO组织绿叶义工、重庆工商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北京歌路营教育咨询中心共同编著的。经过北京歌路营教育咨询中心培训后，绿叶义工的义工和重庆工商大学的学生志愿者担当起老师的职责，给孩子们上这门特殊的课程。

九成流动儿童更喜欢老家

“只有19.1%的流动儿童认为农村比城市好，却有88.9%的儿童更喜欢老家。这两个数字说明流动儿童生活在城市里，对老家的感情没有减退，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他们中的绝大部分都还没有很好地融入自己生活的环境中。”绿叶义工秘书长胡承亮说。

上面两个数据来自2011年绿叶义工对流动儿童的调查。不容忽视的现实是：流动儿童的规模在不断扩大，随着上世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出生的第二代农民工逐步增多，他们开始正视将孩子留在农村老家的各种弊端，选择将子女带在身边进入城市生活和学习的比例越来越大。2005年全国1万人

口抽样调查显示，流动儿童已经增加到了253.7万，并且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增长。

“让我们惊讶的是，有些孩子随父母来到重庆三四年了，从来没见过有着重庆地标意义的朝天门码头、解放碑，没有去过一次公园或是科技馆。”绿叶义工秘书长胡承亮说。“这些孩子虽然生活在城市，但是和城市还有着很深的隔膜。”

令人心情沉重的调查和走访

2011年，绿叶义工采用问卷调查和入户访谈两种方式，选择了江北区猫儿石实验学校南坪响水路、东兴路社区的学龄为1-6年级的学生的家长进行了调查。

猫儿石实验学校是重庆市江北区首批“农民工子弟学校”，在校生中96%以上都是农民工子弟，而另两个社区都是农民工聚居区。

在调查和走访中的所见所闻让胡承亮的心情变得沉重。大量的外来务工人员集中在超市、农贸市场、搬运、家政等服务行业，体力工作为主、劳动时间长、工作收入不稳定。他们每月获取的报酬在1400-2200元之间，必须靠将月生活费控制在600元以下，才能勉强保障子女教育、父母赡养等正常支出。

从居住和生活环境来看，数量众多的外来务工人员聚居在农贸市场、超市或者大型工地等体力劳动型场所附近。家庭居住环境相对较差，电器普及率较低，人均居住面积很小。

胡承亮印象深刻的是一，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居住了3家人，客厅里住的一家还包括祖孙三代。

猫儿石实验学校校长张坤则告诉记者，这种情况并不鲜见，他们走访过的学生家庭中甚至还有5个孩子一家7口只租住一间平房的。

调查获得的数据让人轻松不起来。在被调查对象中，家长的工作时长8小时以上的占总数的67.67%，48.76%的家长没有固定的下班时间；放学后无人看管的学生占25.62%；被调查的孩子中放学后写作业的只占33.7%；有75.9%的流动儿童父母没有给孩子讲过故事。

家长们普遍反映，在教育孩子方面遇到困难：23.1%表示工作太忙，没时间管孩子；22.6%认为功课太难，辅导时有困难；16.6%表示没有文艺特长，不能给孩子更多指导；13.6%认为家里缺少良好的学习环境；还有11.5%认为孩子不听话，

不知道该怎么管；7.3%担心社区里太乱，放学后孩子的安全问题；5.2%担心孩子在人际交往上会有问题，不知如何教育。

“对比父母下班和孩子放学的时间，我们会发现有2-3小时，甚至四五个小时的真空。”胡承亮说，“在农民工聚集的南坪区响水路社区走访时，社区主任告诉我们，他们在巡视的时候经常发现有孩子晚上十一二点钟还在外面玩。这些孩子既面临安全问题，又容易接触社会阴暗面，成为问题儿童的风险很大。”

这份长达54页的《打工子弟社会融入项目需求报告》指出：流动儿童的学校学习生活适应与融入程度较高，而校外的城市日常生活适应较差。他们很少出去接触校园外的城市生活，对自己住的环境和邻居的印象消极，与城里同学深度交往缺失等，体现出流动儿童在更广泛的生活领域存在城市生活融入困难和适应不良。

对农民工子弟的教育不仅是行为习惯的教育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个针对流动儿童的特殊课程应运而生。虽然教材的扉页上印着《打工子弟城市融入与成长》的标题，但北京歌路营教育咨询中心却认为，打工子弟适应城市生活并不是被城市同化，也不应该是一个被动接受的过程，因此这个项目和教材的视角并非“城市融入”，而是“城市学习与探索”。

整个课程分为3部分：室内课程、城市模拟和实地探访。课程借鉴了美国社会学专家戈登的社会融入理论，从四个层面入手，既有城市文化的适应，包括城市技能、规则和礼仪的学习；结构性同化，即发展出新的社会关系；身份认同，即接纳自己的双重身份，有自信；最终能参与公共事务，对社会问题提出自己的意见。

猫儿石实验学校校长张坤说：“当绿叶义工找到我们的时候，我们毫不犹豫地答应与他们配合，因为他们的想法和我们不谋而合。”

但张坤认为：“对农民工子弟的教育不仅是行为习惯的教育，也要注重对伦理道德、价值观的教育。比如说现在农民工子弟的也很多，很多离婚以后，各自带一个孩子住在一起，也不结婚，各自管自己的孩子。有时候老师打电话过去，对方说‘不是我的娃儿，你找某某’。这些都会对孩子产生不好的影响。”

以色列每年将给中国学生250个奖学金名额

本报记者 刘坤

记者从以色列使馆获悉，从2012/2013学年开始，以色列每年将拿出4000万新谢克尔（大约1080万美元），向来自中国的优秀学生提供250个奖学金名额。同时，还将出资1000万美元，与中国联合设立一个科研基金。

在以色列高等教育委员会发出的一份声明中写道，以色列鼓励中国学生在以学习本科和研究生课程，特别是那些以色列具有优势的学科——生物和物理科学、设计、计算机科学、工程和考古学等。此举的目的在于，加深中以两国之间的学术和文化联系。

以色列高等教育委员会总干事莫沙·维格多尔表示，以色列将为本科学生提供100个奖学金名额，为硕士生提供50个奖学金名额，此外还有100个面向博士后学生的名额。据悉，这一奖学金项目的课程将全部用英语授课。

除奖学金外，以色列科学基金会和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将联合设立一个科研基金，双方国家将为此分别拨款1000万美元。

5月6日，维格多尔总干事、以色列计划和预算委员会主席曼努尔·特拉杰腾伯格教授，以及以色列科学基金会学术委员会主席本杰明·盖格尔教授等，开始了对中国为期9天的访问。其间，他们与来自中国教育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人员进行会晤，共同讨论这一项目。

据悉，以色列在研发方面世界领先，这不仅体现在该国研发经费占GDP的百分比上，还体现在该国创业公司的数量和工程师占人口的比重上。2011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就是以以色列的丹·谢赫特曼教授，他已是第10位获得诺奖的以色列裔人士。以色列目前拥有近4000家活跃的技术性创业公司，是除美国之外，世界上拥有此类公司最多的国家。另外，在人均风险投资方面，以色列位居世界第一。

全国首个“京疆学院”在首都师范大学成立

本报讯（记者李新玲）全国首个“京疆学院”5月8日在首都师范大学成立，专门培养新疆未就业大学毕业生。 “少数民族普通高校毕业生赴对口援疆省市培养计划”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与各对口援疆省市合作进行的援疆工程，旨在解决2002年以来沉淀的未就业普通高校全日制本科毕业生的就业问题。采取自愿报名、以岗定人的方式，选派少数民族未就业学员到对口援疆省市培养1-2年，经考试合格后，面向自治区乡镇（街道）事业单位和国有大中型企业就业。

该计划自2011年2月实施以来，已向全国19个对口援疆省市输送近2.2万名学员。北京承担了广播文化、中小学双语教师以及农业、医疗、政法等不同专业近千名学员。首都师范大学已培训700多名学员。“京疆学院”的成立有利于加强管理、整合资源进行人才培养。

国内首个文化传媒EMBA联合培养项目启动

本报讯（实习生冯祥明）近日，在“2012中国国际商学院院长TOP论坛”开幕式上，中国传媒大学与四川大学文化传媒高级工程管理硕士项目（EMBA）正式启动，这是我国首个文化传媒EMBA联合培养项目。

相关负责人指出，该项目依托两校优质的教育资源，开设了特色课程，涵盖了学界专家、名师的理论阐述与研讨，引进优秀经典案例，开展特色企业实地调研，有助于引导文化传媒业的高级管理者实现跨界资源整合和智慧碰撞，进而推动文化传媒领域整体水平的提升。

据悉，被该项目正式录取的学生，将同时共享中国传媒大学和四川大学丰富的教育资源和庞大的校友网络。

华尔街英语创新课程更重商务实战

本报讯（焦玉）华尔街英语近日宣布，在公司成立40周年之际，拓展现有的教学课程，推出全新的PRO职场英语精品课程（PRO Courses）。据悉，新课程具有极强的实用性，能帮助学员从容应对数百种专业性工作要求。华尔街英语将中国列为PRO职场英语的首批投放市场，并已开始接受国内学员的学习申请。

在PRO职场英语的课程中，学员将学习到数百个真实商业环境中所需的英语技能。通过该课程，初级学员将学习如何运用英语进行会议记录、处理电话留言、设计差旅安排以及上司沟通等基本语言技巧。而中级课程将教授学员如何运用英语撰写策划报告、在会议中发表见解，以及设计面试标准等更具挑战性的事项。高级课程将帮助学员实现用专业性英语发表演讲、评估下属员工表现、采访海外办公室以及探讨公司经营目标等管理层面的工作。无论是来自国企、外企还是私企的学员，都可以在该课程中收获满足各类工作需求的英语沟通技巧。

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

别让孩子学一门技术恨一门艺术

本报讯（记者邱晨辉）“我们不仅要关心孩子将来有没有地位、金钱和名声，还要关心当他们拥有这一切以后，他们的生命质量怎么样，他们是否感到幸福。”近日，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周海宏在中科院研究生院主办的“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上表示，真正的艺术教育不单是教会孩子弹什么、唱什么，还要通过艺术学习来培养孩子的感性素质，即体验幸福的能力。

周海宏每年10月都要去爬一趟香山，他发现，在自然风光之间，很多小孩不看风景、也不玩耍，只是手里拿着小抄本记着路边的树名，问他们为什么这么做，孩子们回